

刘尚希 / 著

公共风险视角下的 公共财政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Risk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公共风险视角下的 公共财政

——兼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 公共财政

刘尚希 / 著

公共风险视角下的 公共财政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 / 刘尚希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58 - 8943 - 9

I. ①公… II. ①刘… III. ①公共财政学—研究—中国
IV. ①F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080 号

责任编辑: 高进水 刘 颖

责任校对: 曹 力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潘泽新

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

刘尚希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2.5 印张 450000 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8943 - 9 定价: 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追求 “确定性”（代序）

人，不论干什么，都是在追求确定性。成功、幸福、爱情、金钱、权力、地位等，没有人不希望拥有。拥有的，也就意味着是确定的。雇员追求的是稳定的岗位，避免的是难以预料的失业；商人追求的是确定的利润，规避的是市场风险；政治家追求的是确定的统治权，规避的是失去权力的风险；学者追求的是确定的发现，排除各种可能的错误，如此等等。尽管社会不同主体所追求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但极度抽象言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概念：确定性。就人的天性而言，“确定性”是人人喜欢的东西，而对“不确定性”却是惟恐避之不及。冒险家喜欢不确定性的过程，但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确定性，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支柱。信心、信仰、信用、信任，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它们是确定性的化身。而它们一旦沾上了不确定性，社会就会失序，甚至崩溃。

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无穷的变化之中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危机和灾难。号称具有预知、预测功能的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在内，都无法告诉我们风险、危机和灾难何时何地会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冲突、环境灾难、自然灾害、战争、恐怖主义等，往往等到临近才知晓。当今世界，以所谓科学的名义预测未来的人，比算命先生还多。偶尔有猜中的，就像轮盘赌中押注的人。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逃脱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个充满了风险的世

界。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是在不确定性中去追求确定性，只能是在风险中去规避风险。

那我们该如何去认识、理解和研究这个世界呢？就像笛卡尔所说的：一定不要相信仅从例证和传统说法中学到的东西，这是最好的经验。尽管这种唯理主义所指与当时神学至上的历史背景相关，但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既然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那么，过去、现在与未来，就不可能是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无法用现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去推断未来的状态。未来世界的逻辑可能与现在、过去根本不同。我们需要新的世界观。也许，只有具备了不确定性思维，才能应对不确定性；只有具备了风险的观念，才能防范风险。

世界观的变迁：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不少人相信，人的一生是命中注定的。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就像自然规律，在操纵人的命运，决定人生的悲欢离合、磨难与幸福、失败与成功，福禄寿的多寡与个人的主观努力无关。但也有不少人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要努力奋斗，勤勉有加，可以达到所希望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前一种看法是宿命论的，找人算命看前程的人持有这种观念；后一种看法是非宿命论的，认为主观努力可以改变人生。改换成学术语言来说，宿命论是一种确定性的世界观，世界的一切，包括人自身都已经事先被安排好了，人为的力量无法改变。这与牛顿奠定的科学认知观是一致的。20世纪之前的科学观念都是宿命论的，认为世界就像一座精密的钟表，造物主上好了发条，之后的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规律、利用规律。这种世界观还有其他的表述：世界是机械的、可分及可还原的、连续而无突变的、可以预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是无关的，主观与客观是分离的，等等。非宿命论与此相反，则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变化具有随机性、突变性、非决定性、多主体性及其相互作用的非线性、观察对象与观察者的不可分离性、偶然事件的锁定性。“上帝已经死了”，世界不

会有命中注定的确定结果。20世纪之后的科学观念已经转向后者，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我们曾经发现的确定性，或者说规律，只是一种特例，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质，造物主并未事先安排好这个世界。

对人生的看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毕竟是两码事，但都是一种世界观。科学领域的世界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进行革命，这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来说，是不能不关注的大事。“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当今“神圣”词汇的内涵，也意味着都要重新加以定义。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从原来以为是确定的变成了不确定，那么，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依然可以按照经典力学的科学认知观，被坚持认为仍然是确定性的，仍然有规律可寻？是否依然可以按照过时的科学观念，继续模仿牛顿时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近三百多年以来，在科技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日渐形成了一种确定性的世界观。因果论、决定论、可计算性、可预测性、规律性、必然性等，都是确定性世界观中的词汇。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认识，但却是近代科学的结晶。这种科学宿命论打开了认识大自然的一扇门，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巨大的科技成就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宿命论科学观，并演化为一种弥漫于整个知识界的普适方法。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现代经济学，以至于整个社会科学，都是在这样一种世界观指导下来观察和研究问题的。

然而，世界是不确定的。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原来以为，“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被量子力学给打破了。量子力学发现，上帝经常玩弄骰子，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堡在1926年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一书

中指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性质。”美国数学家克莱因也在其《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指出，“数学不再是一门精确性的学科”，“数学曾经被认为是精确论证的顶峰、真理的化身，是关于宇宙设计的真理，现在则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更多的论述请参看本书中的相关内容）。所谓的规律、决定论、可预测性，也就是存在的确定性，都只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存在。明天的太阳依然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去。这在我们可见的物理世界中和有限时间内是可以预见的，日食、月蚀等自然现象的发生甚至可以精确预测到哪年哪月哪日的几时几分。但我们却无法预测地震在何时发生、明年的农业收成会怎么样、下个月的股指是多少个点，甚至无法断定明天股指是涨还是落。经济社会现象中的非决定论是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也只是我们的大脑对先后发生事情之间联系的一种猜测。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只能说存在某种可能性，却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终结了近代科学观基础上形成的确定性世界观，使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确定性不过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例外，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传统的非此即彼、主体客体分离、决定论逻辑、理性的精确性等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世界观的指导下反思重构。

在确定性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确定性知识系统现在已经无法适应原本就是不确定的世界。尤其是对人类自身社会的认识，世界观的转换更为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宣告，以确定性为假设前提的传统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已无法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来应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

追求“确定性”是人类的心理本能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追求“确定性”。偏安于小小地球的人类，幻想着永恒的存在，在观念中构建了一个确定的世界。追求存在的确定性是人类的永恒终极目标。无论从个体来说，还是

就群体而言，莫不如此。从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术，到对“万岁”的集体呼喊；从柏拉图对爱的理解（对永恒、不朽的渴望），至现代社会对永续发展的追求，都是在寻求个体存在、制度存在、秩序存在、文明存在的确定性。心理本能从动物性的生理本能转化而来，融合了感性、理性与灵性。感性是反射，理性是思考，灵性是觉悟。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个体本能与社会本能会同时产生。

追求确定性是由人类的自我保护天性和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所决定的。没有确定的环境、没有安定的内心、没有可期待实现的希望，人就会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更不用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人类行为中的各种冒险举动，其实也是在追求存在的确定性，不过是不同层次的东西罢了，如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声誉、更巩固的地位、更广阔的疆域、更强大的国力等。在不确定性世界中，人类总是需要构筑一个确定性世界，即便是观念上的，以此来保护和激励自身。这个确定性世界可以是个人的、国家的、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当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大讨论，就是反映出地球人对生存环境的确定性的一种担忧。一个国家追求发展，以图崛起，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层面上，都需要一个由各种知识、观念支撑的确定性世界的存在。

不确定性是一切恐惧的基本来源。回想2003年的“非典”（即SARS）危机，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在“非典”病毒借助于空气肆意横行的不确定性环境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可能被那种致命的病毒感染，生命的存在显得极其脆弱。要不是现代医学知识部分地化解了这种不确定性，社会的集体恐惧将会更大。事后有人统计发现，“非典”的死亡率甚至不如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为什么在“非典”时期的社会恐惧却如此之大呢？原因在于不确定性程度的区别。当现有的知识系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图景时，社会恐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尽管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反之，当现有的知识系统无法给予解释并提供帮助时，恐惧就会产生并放大，原有的秩序就会消失。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但在解释不确定性世界并帮助人类战胜恐惧的过程中，

却发挥着互补的作用。

越是面对不确定的东西，人就会越发感到害怕。如各种恐怖故事或恐怖电影中的妖魔鬼怪，都是不确定性的化身。其实，它们都是人类经受各种各样的恐惧——如瘟疫、地震、风暴、洪水、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屠杀、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社会灾难——之后积淀下来的集体心理阴影，再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出来。现代电影以现代科技手段造出的不少灾难片、惊悚片、鬼怪片，都不过是让现代人体验人类曾经的恐惧，同时也是在不断地提醒和警示，告诉已经习惯于现有知识系统构筑的确定性世界的人类，不确定性的世界并没有被我们人类所改变，风险和危机永远是一把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害怕和恐惧尽管并不令人喜欢（在艺术世界除外），但当它以公共的形式存在时，却可以促成另一种的结果：团结与合作，产生集体行动。面对恐怖主义，各国惊人地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面对战争的威胁，尤其是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战争，各国高举和平大旗，反对战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出台各种应急措施，放弃了经济意识形态的分歧，各国协调合作大大加强，如此等等。这是国际社会以集体的力量在化解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追求集体存在的确定性。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期而至的灾难、危机，往往是集体情感升华的催化剂，也是改变集体思维的转折点，更是孕育集体行动的温床。

科技与制度：追求“确定性”而形成的结果

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活动，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追求确定性。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都是试图从不确定性世界中发现确定性——即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规则。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也都是利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规则，寻求人类自我存在的确定性。这个追求确定性的过程，是同时从两个基本面展开的：自然与社会，但又交互影响。在应对来自于大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过程中，渐渐地产生了科学与技

术，而应对来自于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过程中，产生了制度及其带来的秩序。科技与制度成为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两大有力工具，并以此支撑起了人类自身的确定性世界。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其生存条件是极其不确定的，要靠不停地迁徙，才能维持生存，就像动物的迁徙过程一样。人类之所以能定居下来，是发现了通过人工种植和饲养可以获得食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由此产生，完全靠天吃饭——狩猎、捕鱼、采集野果——的状况有所改变。古人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和节气的变化规律，顺势而为，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耕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由此带来的风险，以农耕为基础的人类文明也就逐渐形成。而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人类更多地理解和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条件和规律，在吃饭问题上对“天”的依赖性大大减弱。人类吃饭问题的确定性增强了。越是发达国家，其确定性程度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小；相反，越是不发达国家，其确定性程度越小，而不确定性程度越大。这反映出人类在追求确定性过程中的全球不平衡。毫无疑问，在吃饭的问题上，美国人面临的不确定性比非洲人要小得多。

人类是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却感到好奇。正是这种好奇心，造就了人类的理性，使人学会了思考：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不断探寻大自然的奥秘，人类积累了大量关于大自然的各种知识，发现了大自然的许多规律。这些知识和规律，使人类部分地化解了来自于大自然的诸多不确定性。在古人的眼中，“天有不测风云”，这是对大自然不确定性的一种无奈描述。现代气象学的发展，加上人造卫星等先进观测手段，天上不可测的风云变成基本可测，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越来越高。对各种日食、月食的准确预报、人类飞天梦想的实现、导弹的精确命中等，都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所带来的确定性。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自然规律，从而造出了高楼大厦，发明了电灯电话，创造了海陆空各种交通工具，形成了通讯信息网络，生产出各种生活用品。诸如此类的科技文明成果都是人

类在认识了大自然的基础上，通过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性，使不确定性转化为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而实现的。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创造了一个人化的确定性世界。

科技的力量，使人类不仅仅是适应自然，而且还可以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蒸汽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加速提升，自然“被人化”的痕迹越来越深。承载着众多生命的地球，唯独被人类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为止，科技文明这个大厦依然建立在“确定性”这个基础之上。追求确定性，带来了科技文明，也引发出理性主义的滥觞和人类的自我膨胀。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人类的使命》一书中所宣称的：“我要做自然的主人，自然应该是我的仆人，我要根据我的力量来影响自然，而决不该由自然来影响我。”这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狭隘，把特殊性当成了一般性，把一定条件下存在的确定性当成了世界的一般本质。其实，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到今天，也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对人类自身的威胁比任何时代都要多。一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会给人类带来某种好处，而危害却要靠漫长时间才能验证，从几年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些科技发明带来的危害已经日渐显现，已经被禁止或被限制使用，如含铅汽油、剧毒农药、化肥、添加剂，但更多的是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如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合成药物等。人类科技文明的现有基础——确定性，已经被颠覆了，正在被“不确定性”这个更宏大、更一般的基础所取代。如果说在人类科技文明不发达的时候，大自然的许多不确定性是人类没有认识到上帝造物时的规律而造成的“误解”，那么在今天人类已经认识到，上帝造物时根本没有什么规律，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这意味着，牛顿时代开拓的科技文明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追求确定性应选择一个新的起点。

与科技文明并行的是制度文明。而制度文明是应对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追求集体存在的确定性的产物，并在逻辑上构成科技文明发展的前提。科技文明构建了人类之于自然的确定性世界，而制度文明却构建

了人类之于自身社会的确定性世界，这包括了组织、规则、秩序、结构。恰恰是后者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将在高度不确定性中自我毁灭。

较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更为复杂、更难认识清楚。由此也使制度文明的进化比科技文明更曲折、更艰难，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是难以靠人类的理性来直接构建的，具有某种“自然进化”的属性，无法靠逻辑推理去预测未来的制度样式。从起点来看，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而从一个过程来看，制度是人类社会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无法设计的。具体的法律可以修改，但是是否需要法律却不由人类理性来决定。而隐性的制度，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连人为的修改都难以做到。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废除，并不因理性而改变，而都是社会一定时期的不确定性放大以至于超越某一个临界点所导致的。人类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也是人类自身无法预测的，就像任何一个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前程命运一样。

人类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会衍生出制度——因为从分散个体的“原子人”状态转变为具有公共意志的“集体人”行为是靠制度来完成的，但无法知道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制度。在三十年前的人们，恐怕谁也没有预测到中国会搞市场经济。三十年之后，中国是否依然会搞现有样式的市场经济，这同样是难以预见的。这好比生命的繁衍，我们凭经验观察可以知道阴阳结合会产出后代，但无法知道会产出什么样的后代。人类追求自身集体存在的确定性，制度产生于这个过程，但却无法由人类理性来直接决定。从简单到复杂的制度进化，是与社会这个有机体的进化成长相伴随的。社会有机体越是复杂，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制度也就由简单变得复杂，就像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也是随着动物的进化而变得复杂的。

人类是以两种方式同时存在的：一是个体，二是群体。任何一个人，既是一个生物的个体，同时也总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像老虎一样

独来独往于“社会丛林”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无法生存。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要靠集体行动的力量，而要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力量，其起源是一个不亚于生命在地球上诞生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是其最终成功的关键，它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演变成为一种相对确定的社会结构，人类也就得以生存并不断进化。

家庭制度的出现，类似于生命形成过程中细胞的产生，成为人类得以集体进化的微观基础。而氏族或国家制度的出现，则是人类集体存在获得确定性的基本形式，使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活”的复杂有机体。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国家不过是由人造出来的“人”而已，统治权是其灵魂，灵魂带来了生命和活动。国家的各个部分依据约定结合在一起，这个约定就是律法。假如没有国家这个“集体人”的诞生，地球上的人类可能早就灭绝了，即使能幸存下来，恐怕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猴子也没有什么两样。一是因为无法形成集体的力量，分散的个体只能是其他动物的嘴中食物；二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让大家畏惧的公共权力，人类相互为敌，最后在自我冲突中毁灭。这两种不确定性，最终由于国家制度的产生而转化为一种历史的确定性。

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个确定性基础上实现的。但具体到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则其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历史上的国家与现代的国家也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多样化。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相同的两个国家。这与大自然的生态进化是类似的。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其生态各不相同，其位于相应区域的国家制度也千差万别。这说明，人类集体存在的确定性有多种实现形式，彼此难以模仿。国家制度的地域性特征显然是进化的结果，这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发展——获得集体存在的更大确定性——都不能以他国为样板来临摹。若违背了这一点，无论任何国家，其在地球上存在的确定性就会大大降低。

不确定性、公共风险与风险理性

人类在不断地创造历史，但却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河水总会向低处流，可它不能决定河流的走向。具有普遍性质的不确定性使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限制，理性时常会失灵。

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却离不开理性的力量。追求确定性，这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集中表现。理性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构建确定性世界的的能力，并以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规划设计为基本要素。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给我们描绘的都是一个确定性世界，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理性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理性构建的确定性世界，给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就像我们居住的房子。相比原始人，房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世界，避免了外界很多的不确定性，如野兽的攻击、天气的变化、歹人的袭击等。

房子是看得见的，但还有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抽象的房子：公共风险理性。这既是一个概念，同时也是集体存在的庇护所，是人类运用理性构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的房子，以避免不确定性世界随时带给我们的集体伤害。制度就是这所看不见的房子的化身。国家就是地球上不同族群的房子，保护着它的每一个成员。国家内部的各种制度，就是这所大房子内的各个房间，对整体与局部、组织与个人等各个层次的主体行为进行协调与管理，以形成一种社会秩序，避免相互为敌，彼此伤害。不确定性世界是黑暗的，也是无序的，人类难以生存；而确定性世界是明亮的，有序的，人类的家园。理性就是这个确定性世界的太阳，照亮并滋养这个世界中的万物。

理性的预见功能在确定性世界可以做到很精确，但在不确定性世界只能是指出某种“可能性”，甚至连“可能性”都无法预见，因为逻辑推理失灵，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有限的。但理性与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孕育出“风险理性”，在不确定性逻辑的引导下，形成一种新的思维产物：忧患意识和风险理念，进

而形成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行动能力。

从理性到风险理性，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一个转折点，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进化。面对不确定的世界，理性是以确定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许多场合是失效的；而风险理性则以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以确定性为归宿，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虽然二者都具有构建确定性世界的的能力，但其认知基础不同，或者说世界观不同。尤其在经济、社会领域，风险理性所显现的价值更为显著。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对发生在眼前的危险采取措施，而人不仅会躲避眼前的危险，并且还会对远离自己的危险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人通过抽象思维产生想像和推理，也会产生惧怕的心理，而动物却不会。就像听鬼故事一样，听的时候津津有味，听完之后却感到害怕。正如挪威哲学教授拉斯·史文德森在《恐惧的哲学》中所说的：一只兔子不会害怕远方的老虎，但人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怎样的行为表现，而观念却是通过不同的理性思考抽象出来的。老虎吃人，只是个别事实，是一种可能性。但通过抽象思维，这种个别的事例转化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老虎是危险的动物，从而形成风险理性。只要“想”到老虎，通过风险理性思考转换而来的心理恐惧就会使人警觉，从而事前规避可能的伤害——风险，不会像动物一样，事到临头才逃跑。只有“风险理性”才会产生风险意识，进而产生规避风险的事前行为。

这种事前的避险行为是理性预见功能在不确定性领域的延伸，形成风险理性，转化为一种预警功能。如果认为确定性是世界的普遍性质，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风险，顶多只有认识错误而带来的风险。只要认识了更多的所谓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由于认识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就会趋于减少，甚至消失。按照这样的认识，风险是可以消除的，风险理性也就不会产生。可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大自然本身，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加速，同时不确定性也在同步扩大，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对于一个生活在父母制造的确定性世界的孩子来说，不但不

会有风险意识，甚至连危险临近都没有惧怕的感觉。这样的孩子丧失了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一旦离开父母制造的确定性世界便无法生存。一个国家若也是像这样的孩子，被一时的和平景象和盛世繁华所障目，则国家危矣！正是风险理性，形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预警机制。

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这种风险理性一经产生就会被一代代继承下来，逐渐转换为一种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本能，社会对风险感知的敏感性同时也不断增强。例如，对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人们的判断并不需要像作数学题那样有太多的思考，已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好比驾驶汽车，初学阶段要靠“理性的思考”——如何启动、怎样换档、何时刹车，而到了熟练阶段，这些动作则无需思考，变成了一种凭本能反应的操作。

风险理性是基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经验积累而形成。从个体和集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经验积累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了个体风险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前者产生个体行为，如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就是个体风险理性规避市场风险的行为；后者产生集体行为，如2008年底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就是公共风险理性规避公共风险的行为。这是风险理性在个体和集体，或者说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发挥作用的表现。如果说，在个体意义上，理性和风险理性还有区别，那么，在集体意义上，公共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实际上是同义的不同表达，公共理性天然就是公共风险理性。拿数学家和企业家来说，前者是理性的代表，却不一定具有风险理性；后者是风险理性的代表，与各种风险打交道，总是在不断地评估、权衡和选择风险。而公共理性本身就是公共风险的产物，若是没有公共风险，则公共理性就是多余的了。从公共理性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和公共风险相伴随的。

公共风险理性，为集体成员提供一种社会化的预警机制，通过集体行动，最终“沉淀”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例如：国防制度是预防异国可能的侵略；宪法是预防公权对私权的侵